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丝绸之路与敦煌学

柴剑虹 著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丝绸之路与敦煌学

柴剑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绸之路与敦煌学 / 柴剑虹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2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5521-2

I. ①丝… II. ①柴… III. ①丝绸之路—研究 ②敦煌学—研究 IV. ①K928.6 ②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2006 号

丝绸之路与敦煌学

柴剑虹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王荣鑫 唐妙琴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98 千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5521-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 1897 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 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 21 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目 录

我与丝路敦煌学	(1)
敦煌学与敦煌文化	
——在“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上的演讲之一	(7)
敦煌文献与西部开发	
——在“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上的演讲之一	(28)
“瀚海”辨	(52)
“葫芦河”考	(59)
轮台、铁门关、疏勒辨	(64)
“桂林”、“武城”考	(71)
胡旋舞散论	(75)
《贯云石及其散曲》补叙	(85)
敦煌题画诗漫话	(91)
与库木吐拉有缘	(95)
我的克孜尔情结	(102)
敦煌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特性	(107)
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	(134)
“敦煌守护神”的回答	(147)
魂系敦煌五十春	
——记“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	(157)

今天,我们怎样守护敦煌?

- 纪念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暨常书鸿先生百岁生日
..... (161)

论“常书鸿精神”

- 在常书鸿先生 100 周年纪念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
..... (168)

《敦煌学概论》前言 (172)

读《蒋礼鸿集》的体会 (175)

献给敦煌学百年的厚礼

- 《浙藏敦煌文献》出版感言 (179)

《敦煌学述论》新版序言 (183)

《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序 (186)

十年一剑,功力毕现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读后 (190)

丝绸与飞天 (193)

说“天衣” (202)

壁画丝踪

- 兼及观瞻斯里兰卡石窟得到的启示 (210)

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原德藏新疆壁画简析 (216)

敦煌古代体育与岁时节日文化 (225)

读《吐鲁番考古记》札记 (235)

谈“别译”

- 读《吐鲁番考古记》札记之一 (248)

生态环境与佛教石窟保护

- 以龟兹石窟的保护为例 (255)

附:

佛教造像和石窟艺术的保护、研究、传承、发展

——在亚洲第二届佛教文化节“佛教艺术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 (265)

关于如何推进石窟艺术研究的思考 (268)

龟兹学与国学 (273)

藏学与国学 (279)

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 (284)

学术期刊的学术视野与创新

——为《敦煌研究》创刊三十周年而作 (289)

探寻历史文化传承的踪迹与规律

——新疆文物学习札记 (294)

继承发扬学术团队精神

——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创建 30 周年而作 (310)

国际敦煌学: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兼谈韩国的丝路文化与敦煌学研究 (317)

拓展学术视野,注重个案研究

——在“敦煌服饰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学术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 (324)

关于“丝路文物”几个问题的初步思考 (328)

关于构建敦煌学史的若干思考 (333)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吐鲁番学的一点思考 (345)

关于日藏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几点浅见 (352)

野马倏忽扫尘埃

——《野马,尘埃》代序 (356)

《汉晋十六国木板绘画》代序 (360)

多元、异彩 规范、创新

——读“敦煌讲座书系”感言 (365)

《敦煌文选》序 (369)

《西域汉语通行史》序 (372)

《昆山识玉——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代序 (375)

《唐宋词概说》代序 (378)

【附录】

雪泥寻踪

——访王国维、罗振玉京都旧居遗址随笔 (382)

柴剑虹:交流,才能互以幸福相交换

——《生活周刊》采访纪要 夏楠 (385)

我与丝路敦煌学

佛教典籍自流播之初,便有“因缘”(梵语 Hetupratyaya)之说,用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事物生成或坏灭的主要条件为“因”,为其辅助条件者称“缘”。故云:凡事均有因缘。这恐怕与见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中强调机遇的“因缘”有很大的差异。

我从小生长在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与大漠孤烟、戈壁绿洲的丝路“咽喉”敦煌间隔万里,究竟因何结缘,也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在 15 年前出版的拙著《敦煌吐鲁番学论稿》的“后记”中提及,但当时考虑很不成熟,仅寥寥数言。现在,趁编辑此书的机会,试图再多讲几句,以求识者指正。

1949 年 9 月,刚满 5 周岁不久的我背着书包到离家很近(直线距离 200 多米)的一所小学上学。学校就在当时已经不再开放的昭庆寺侧门的一个院落内,这应该是杭州佛教界办的一所小学,故老百姓均称之为昭庆寺小学,其正式校名为“私立普化小学”——普化者,可以有“普度众生”和“普及文化”的双重含义。其实,按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来分类,这应该是区别于公立(官办)、民办(私立)的一所“寺学”学校。普化小学的源流沿革,我准备另行细究。因为我上小学时,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我随着信佛的祖母生活,送到附近的佛教小学读书,就很自然了。我的印象中,校舍小而简陋,学生也不很多,初小几个年级的孩子常常合并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称为“复式班”。上、下课除了校工摇

铃外,还可以听悬挂在教室旁的撞钟声。朗朗书声伴着洪亮的梵钟声回旋在寺院旁,也冲击着幼小的心灵。也许就从那时起,此生开始与佛教及佛教文化结缘。学校老师不多,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蕴玉老师,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趴在桌子上写字有困难,常常是王老师坐在凳子上抱着我习字——我已无记忆,这是我三十多年后去看望她时得知的。当时的小学校长叫李家应,我模模糊糊只记得是一位短发的中年妇女。在我保存的初小、高小的毕业证书上,都有她的签名。最近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位“民国传奇女子”:她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徐悲鸿先生挚爱的孙多慈女史的同窗密友,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抗战时期参加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担任第一保育院院长,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杭州解放后,她被派往浙江干校学习,后在杭州佛教会任干事,大约也同时兼任我们的小学校长。据说李校长 1958 年转入杭州佛教协会下属的一家工厂工作,1960 年因病去世,刚满 50 岁,也是英年早逝。普化小学之后的校长是谁,我不清楚。记得 70 年代后期我到北京广济寺拜访巨赞法师,法师对我说:你们小学的校长后来到北京担任《现代佛学》杂志的编委,“文革”中受迫害而死。这是哪位校长我无从知晓。普化小学后来也搬迁至临近的宝石山下,改名断桥小学;昭庆寺则改建为杭州市少年宫。但我觉得自己与佛教小学缘分始终存在。

我小学毕业后考到杭州一中(杭高)读书。学校的前身是养正书塾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这所在 19 世纪末维新思潮背景中兴办、发展的新式学府,历届师生中文化名人、科学家、政治人物辈出,被称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名家大师曾经驻足守望的驿站,仁人志士、文化名流启航的港湾,科技精英、中外院士成长的摇篮”。在我上学的 6 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家

崔东伯老校长每次在全校大会上都要强调的“继承发扬杭高的传统”，感受最切的是一大批优秀教师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与爱国情结，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记得在1959年的6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在观赏洪雪飞学姐精彩演出的同时，我知道了李叔同曾经是学校的音乐、图画教师，戏剧演艺精湛，还培养了杰出的画家丰子恺先生。李叔同后来出家人佛门，成为在佛教界影响深远的律宗大师（弘一法师）。尽管那6年里政治运动不断，但杭高注重基础知识教学与良好的人文环境使我终生受益。

1961年秋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师大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合格的中学教师。学校名师汇聚，学术氛围很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老校长的学问举世瞩目，无需说他对佛教与其他宗教的研究贡献至巨，也无需说他主持编写的《敦煌劫余录》在敦煌学史的地位无可撼动，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扶助与教育下的启功先生，后来成为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敦煌学研究的恩师；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程今吾到校任党委书记后，还特别重视抓学生的写作训练，规定文、理科学生都必须写作过关，1964年举办全校征文比赛，我的散文习作《茶山青青》得了二等奖，成为一种鞭策。当时中文系里黎锦熙、钟敬文、刘盼遂、黄药眠、李长之、陆宗达、俞敏、萧璋等许多名教授都是我们的学术楷模，为我们年级授课的郭预衡、杨敏如、邓魁英、辛志贤、谭得伶、陈子艾、童庆炳、程正民、韩兆琦、张之强、刘锡庆等优秀中青年教师，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强调教学相长与科研并举，提倡创新精神，为我们的学业付出了许多心血。

大学毕业时，“文革”开始，我志愿到新疆当教师。乌鲁木齐任教10年，锻炼心志，专心育人，也成就了我的西域情结，并为日后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1978年考回母校读研究生，1980年开始我准备唐代边塞诗研究的学位论文，初涉敦煌